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张锐锋：有人性温度的历史，藏在宏大叙事的小缝隙里

□本报记者 王泓烨



张锐锋

和“古灵魂”进行一场敞亮的“长谈”

记 者：《古灵魂》是一部恢宏的“大书”，其创作原点始于您十几年前探访曲村—天马遗址的震撼体验。当时的见闻带给您怎样的冲击，让您决心开启这场浩大的文学创作工程？

张锐锋：震撼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体验，它带着某种突然性和陌生感，包含着众多疑惑、问题、未知和不安。

一次偶然的参观，我看见了由考古队员发掘完成的晋侯墓葬现场，巨大、深邃的墓坑和规模宏大的车马坑，让人感受到古代君王驾车远行的场景。他们是谁？遇到了什么？生前怎样生活又怎样思考？他们的生活和选择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联？对于他们的一切，历史记住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恢宏的现场指向了他们的命运构图，辉煌与断崖跌落，也许是瞬间发生的。问题和未知，是写作冲动和灵感被触发的关键。我希望自己能探求这片土地上的从前，从未知中找到确定的回答，也渴望在自己的写作中与他们相遇，“看见”他们，和他们进行一场敞亮的“长谈”。

我开始阅读各类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这场灵魂“长谈”做准备工作。很多事件只有几句话，一掠而过。真正激发写作渴望的不是事实的完整性，而是残缺让人获得补充和想象的欲念与冲动感，它是写作激情的来源之一。我决心将古代生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泥土中打捞出来，让古代的灵魂从他们散乱的骨架上站起来，让他们开口说话，我作为倾听者站在旁边，逐步进入他们的心灵。

我和众多的“古灵魂”相处，和他们一起经历悲欢离合和命途选择。原本打算在百万字左右完成这部散文著作，但历史在延伸，我跟着奔跑，一直追踪到晋国最后一个国君消失在泥土里。

记 者：具体创作中，您如何界定史实考据与文学虚构的边界？如何既不离脱历史本质，尊重历史脉络，又让史料长出人性的温度，完整还原历史现场？

张锐锋：虚构的前提是依靠证据进行必要的判断和推测。必须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从结构中提取自己的想象，从历史材料中提炼人性。文学从史料缺失的部分展开，从还原现场的渴念中发酵，在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找到融合点。它们之间的边界基于对事实和结构的判断与推测。只有这样，历史现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意味深长的种种细节，才能被复原、复活和重演，让历史碎片在文字黏合中重建其完整性和秘密本性。

记 者：您认为，“历史的细节是值得欣赏的”。为何这些

采访

手记

如果你相信“文如其人”，那么你会从散文家张锐锋这里得到印证。他的文字厚重深邃、沉静隽永，而他本人的品性和气度与笔下文字完美契合，温柔且有力量，谦和又有坚守。

采访张锐锋老师之前，我并未与他结识。打通电话后，我自报家门并表达了祝贺，张老师连连道谢。他的声音温润醇厚，带着一丝低沉的质感，语速平缓从容，不疾不徐，让人感受到沉稳笃定。后来，在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的启动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和张二棍



《古灵魂》，张锐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过程与细节，比史书定论的更值得被书写、被看见？

张锐锋：藏在历史褶皱里的种种细节之所以值得欣赏，是因为那些细小的、经常被忽略的东西中，有着人性的温暖，有着驱动历史的内在力量，对文学来说也有着更多美学价值。这样的细节常常被宏大的叙事掩盖。

微小的细节可以展开一个巨大的多维世界。它更具现实性，里面有我们理解自我、照亮灵魂的材料。历史总是被结果绑定，形成我们对历史价值的判断，这是功利主义的历史观。王朝霸业是个人雄心的实现，它总与生活本身的追求背道而驰，但更容易被看见。在众声喧哗的世界里，对普通人的倾听才更加重要。有人性温度的历史，藏在宏大叙事的小缝隙里。

“历史中透出的微光，照出了我自己”

记 者：您曾表示书名《古灵魂》的核心寓意，是发掘古人的内在心性、解锁历史个体的精神内核，而非简单复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您认为晋国 600 余年乱世兴衰中淬炼出的“古灵魂”，包含哪些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张锐锋：我希望这个书名能够概括某种历史的“暗能量”，希望自己不是写出一部由无数历史事实罗列出来的说明书，而是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分子式。它包含已知和未知，包含不可揭示的秘密，也包含求解的动机。

我让众多的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站在舞台的中央，让他们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可这仅是我站在另一个时空对他们的理解。我是站在他们身边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他们被“看见”和“被”听见”，是因为他们在各种文字资料中若隐若现。资料不可能呈现全部，我只能从其中搜寻和提炼。从他们的影子里，我看见的是自己，听见的也是自己。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有着那个时代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辩护，寻找生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的声音中，有我内心的东西。历史中透出的微光，照出了我自己。

历史事件中包含众多的参与者。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人性事件。因而，这样的写作不是注重更多地展开事件，而是如何专注于人的内控，外在呈现的事件转化为内掘过程中长长的投影。这一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人的精神内核逐渐露出水面。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最终结果又是确定的。

一同代表山西省作协向沁水县捐赠图书。那天他衣着简约，话并不多，始终笑呵呵，举手投足间尽显沉稳内敛。

张锐锋的获奖作品《古灵魂》有 200 余万字。如此厚重的篇幅，在当下这个“快阅读”的时代多少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实际上，我对他更多的是钦佩，佩服他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耗费十余年心血打磨出这样一部散文力作。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学坚守，这份纯粹赤诚的创作初心，在当下尤为珍贵。

漫长的晋国历史，不是散乱一团的变化烟云，而是由各种事件节点形成某种可理解的结构和由结构生成的强大动能。历史事件是表盘上的指针，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发条和齿轮机构，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艺术装置。20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帕里西长周期观测并研究掠鸟群的集体飞行行为，发现鸟群飞行中不断变化着形状，生成各种奇异的图形，但它们却不会彼此碰撞。这是因为，每一只鸟都保持同一个方向飞行，保持几乎确定的距离。历史也是这样，无论多么复杂和变化无常，都是由一些简单规则决定的。我们之所以面对历史感到迷茫和不可预测，是因为简单可以组成复杂，但复杂却不能还原为原初的简单。

我觉得，“古灵魂”比我们更纯真，也更崇高。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多从天下大义出发，而不是为了追求一己私利。为了某种大义或者个体尊严，可以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肉体不仅是物质的，它因灵魂而存在。也许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就在其中，即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

记 者：《古灵魂》暗藏“论辩”的色彩。无论是人物自我内心的多声部博弈，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交锋，甚至作家与读者、古今视角的隐秘对抗，都是论辩的体现。这种充满思辨性的书写，如何最大程度地展露人性的复杂多元与历史的多维真相？

张锐锋：历史和文学叙事，背后暗藏着激烈的论辩。《古灵魂》中，我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放大和强调了论辩的冷峻和严厉性。这一方式，来自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加缪戏剧《卡里古拉》和《正义者》给我的启迪。戏剧中的对白和独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诗性的雄辩，它可以建造《古灵魂》写作的调性。我把独白语言称为“神圣语言”，它起源于古老的祈祷。这样书写的好处是，可以让人性、人的心理状态和隐秘的思考逻辑浮出表面，让它与外在的生活境遇和命运构图建立相关性，实现对世界真相的最简洁和最有效的理解。

历史写作总是从问题开始

记 者：请结合您多年来的散文实践，谈一谈对于历史文化大散文的思考。

张锐锋：历史文化大散文已成为持续多年的写作热点。人们不断撷取历史中的某个片段作为写作素材，是因为历史中含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文学材料。历史的丰富性，提供了现实生活经验中缺失的部分。历史的内部蕴藏着民族共同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认知图景，有共同体的集体理想、审美取向、道德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它与现实之间存在某种持续的镜像互映。现实处于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从来没有脱离历史而独立存在，因为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向未来走去的。不管生活怎样变化，都会在我们内心深处留下长长的光影痕迹。

发现和提出某个问题，是历史写作表达意向和灵感获取的重要源泉。它能够调动我们的现实经验和唤醒沉睡的个体记忆，也能够将自我认知、知识碎片、历史材料中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逻辑、理性的激情、非理性的潜意识和个人抉择联系起来，进行有效的梳理整合，生成具有复杂联系和丰富信息的意义结构。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是剧本，而一切都需要人的演出。然而这样的剧本也不是事先写好的，而是始终充满悬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结果来反推原因，重新梳理其中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关联性和逻辑关系。人是历史可以解析的最小单元，是历史动能和可能性的来源。在宏大历史叙事中，

长阅读的式微，不仅是阅读习惯的改变，更是深度思考、耐心沉淀能力的缺失。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就连看短视频也要开二倍速，有多久没看过一部大部头作品？又有多久没精心写一篇长文章了呢？我还有这个能力吗？我常常在这份自我叩问中感到惶恐。让人庆幸的是，还有作家坚持把作品写长、写丰富。张锐锋用创作、用文字、用言行告诉我们，快时代需要慢沉淀，长阅读、深思考才是治愈浮躁、丰盈内心的底气。

人是最容易被简化、被忽视的。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进行重建现场的努力。文学家的求真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求真，需要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需要从自我出发，寻找和弥补史料中缺失的部分。

历史的结构是复杂的，它的每一个节点都由事件打造。在文学中，每一个事件呈现的都是一张张参与者和见证者的生动容颜。他们不是地下发掘出来的骨架，而是一些站起来重新捡起自己血肉的生活者。我们从他们的命运中看见自己的命运，从他们的疼痛中感受人世的惋惜、遗憾和悲悯，从被遗忘的空白中捕获失去的细节，从他们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形象。重要的是，历史是最具戏剧性的，许多事件和细节没有明确的意义。这些含混不清、混沌复杂的东西中，恰好含有文学值得挖掘的宝藏。

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关键在于选取怎样的历史文化内容，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和用什么样的文字表达。它表面上在叙述历史，实际上仍然是讲述自我。在这样的写作中，历史和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建造者，也是历史结构的链结点，历史借助他们而得以展开自身。

记 者：您的《古灵魂》有 200 余万字，体量浩大。现在是一个“快阅读”的时代，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文学作品的“长度”与“厚度”？

张锐锋：的确，很多人以视频代替了阅读，多元媒介吸引了眼球，阅读变成了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写《古灵魂》的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把自己关注的事情写下来，出于自我的表达渴望、持续的写作冲动，甚至是一种“忘我”的状态。我原本没想写这么多，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就像骑着一匹受惊的马，想停下来，但马还在疾驰。我给自己的安慰是，抛弃一切理由，将想说的都说出来。

当然，这样的写作，是一次逆水行舟的漫长努力。它似乎违背了当下的阅读逻辑，是对“快阅读”的反叛，与现在许多人的阅读习惯背道而驰。但我相信，总会有人希望坐下来获得安静的旧时光，被“旧光线”照耀，也总会有人需要这种“长阅读”，让自己在历史长旅中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相遇”。

读者在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而写作者也在选择潜在的阅读者。一部作品不可能被每一个人阅读，只可能被某一类人阅读。写作的意义也许是在寂寞中感受到同行者的脚步，倾听和寻找每一个同伴的反馈，得到充分的或不充分的，甚至是十分微弱的回声。

很多人读完《古灵魂》，将自己的感想写在书页的空白处。还有细心的读者在每读完一部分之后，都会写上自己阅读的具体时间、加盖名章。还有一些朋友读完之后写出了精彩的评论文章。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知识和文学的呈现是多方位和多角度的，我深知自己这种写作近乎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对我和读者都是苛刻的考验。每个阅读者，都代表一个群体。他们仍然需要这样的“长度”和“厚度”，这就是我写作的重要理由。“长度”仅是可见的篇幅和文字量，而“厚度”取决于信息密度、思考和理解深度、情感力和表达力，取决于体验和揭示人性的深度，以及能否直抵人心的言说方式。

对于历史文化散文来说，如何将写作者自己的情感体验、个体经验、思考角度灌注到文字中，让自己参与到历史和现实的重构中，从历史的丰富性中找到思考点，发现埋藏在其中的认知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古灵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调整自己的过程，是将自己的现实激情不断注入历史材料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实现自我、现实和历史的多重互映。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将聚焦点放在人的状态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人的意义上看见历史的价值光芒。

■记者观察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探寻诗歌的精神力量

——第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观察

□本报记者 教鹤然

技术迭代的速度前所未有，算法正在重塑人们的感知方式，短平快的阅读节奏挤压着深度阅读的空间。在这样的时代里，讨论诗歌，讨论一种诞生于农耕文明、以语言精微性为生命的艺术，似乎是一件有些奢侈的事——甚至会被质疑：还有必要吗？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当情绪被商品化、被量化，甚至被当作流量来收割的时候，诗歌所承载的那种独特的精神体验，反而显出了它的重量。重新追问“传统如何活在当下”，就不再只是学界的内部议题，而关乎一个民族能否在变革中坚守自己的精神坐标。

这正是第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的意义所在。8月7日，近70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大雅堂畔，共同探讨中华诗歌文化的传承路径与创新活力。这次会议的议题涵盖了从古典诗文到当代诗学的广阔视域。在大会主题发言环节，祁和晖、管福瑞、钱志熙、胡可先、曾明、吴怀东、王飞等学者，围绕古代名家诗文创作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等议题展开研讨；方长安、张桃洲、颜同林、赵思运等学者则聚焦“AI时代的诗教”“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何传承与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史遗存”等前沿话题，进行传统与当下的深度对话。会议设置了四个分会

场，与会专家分别围绕杜甫研究、黄庭坚研究、三苏研究、大雅文化研究、诗教传统研究、诗人纪念地发展研究、诗歌文化转化利用研究等方向深入交流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在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复杂的当下，诗歌之美不再是单一维度，而是立体多元的；它不仅带给人审美层面的情绪体验，更具备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能够助力人在技术时代构筑精神内核。

宏大议题之外，分组讨论将这些命题进一步落地。当古典诗文研究与当代诗学议题并置，如何避免古今议题自说自话，真正完成传统向当下的延伸，成为不少学者思考的重心。针对时下热议的诗歌的“情绪价值”，与会学者也展开了深入辨析。《诗刊》社与《星星》诗刊杂志社曾在今年6月联合主办了一场以“诗歌与时代情绪价值”为主题的座谈会。《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致辞中提到“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分组的情绪价值”。两个月后，在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的分组讨论现场，李恰以“诗歌的情绪价值：玫瑰花与赤练蛇的对话”为主题，对这一观点作出了回应。他谈到1924年《语丝》周刊发表的鲁迅的白话打油诗《我的失恋》：“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他认为，在小乘佛教的典籍中，“灵蛇”的故事意味着“报恩”，“赤练蛇”与“玫

瑰花”本质上都是表达对爱人的感激之情，但是其中的情绪并不“通约”。在那个时代，鲁迅总是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绝，如《而已集·小杂感》中所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据此，李恰认为，今天的“情绪价值”本不是诗歌艺术的专属，而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概念。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辨析“作为‘可通约的’‘有价值’的情绪”和“情绪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进而理解诗歌的情绪表达背后蕴含的极其复杂的精神状态，何以成为真正的“价值”。诗歌评论界主动关注“情绪价值”，让文学和诗歌回应当下人们的诉求，可谓2026年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热点。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热议，是在“失去共识”的时代努力为诗歌正名，尝试把诗歌拉回到受全民关注的位置，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当代诗歌创作与日常生活之间情感联结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李恰聚焦诗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功能，刘福春则从诗歌文献学角度，提供了另一种反思路径。“当价值等于零的时候，情绪可能等于一百。文学创作如此，理论评论与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刘福春探讨的问题是诗歌史料研究的有无之辨。他认为，说有容易，说无难。一般的学术研究大多数是“有”的学问，关心的是能见到的文献与材料，鲜有探索“未见”

或“未出”的。诗集编目资料中“见目而未见书或未出诗”的一页，恰恰打开了文献研究的“无”。他希望，当下的青年学者们能更多关注“无”中深处存在的“有”的学问，勇于探索新领域，敢于发现新事。

在不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古人的诗歌精神，恰恰可以回应当下关于情绪、价值的种种讨论。古典与当代诗学探讨时常各有言说，真正打通二者，才是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方长安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儒教传统的“诗教”逐渐转变为现代诗教，为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提供精神底色。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重新研究从古至今的诗教传统的显流与潜流，发掘其精髓，阐释其价值，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探索并建构新时代的诗教文化。

中华诗歌研究院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每次会议都以“传统与当代”为主题，邀请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致力于打破古典与现代的学科分野和学术壁垒，推动中华诗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思考如何回到中国文脉本身，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讲好中国诗歌故事贡献学术力量。